



落红最是有情物

——记郭在貽先生

李浴洋

“齐鲁之秀”

郭在貽先生(1939—1989),号旻龠(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仪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笔者注)斋、冷凳斋。1939年1月11日,郭先生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的他,由母亲和大哥抚养成人。大哥郭连貽先生大器晚成,现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在书法创作和古籍整理等领域均有建树。二哥南下参军,不幸早逝。三哥在两岁时夭折,不入族谱。因此,郭在貽先生排行老三,在给大哥的家书中多以“三弟”自署。

碑楼村三面环山,气候宜人,尽管地处北国,却颇具江南情调。这里的乡风在齐鲁大地淳朴和厚重的基础上,平添了几分温润与精致。年少的郭在貽聪颖好学,大哥至今珍藏着他读小学时使用的作文本,字迹清秀,语句通顺,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一个未及十岁的孩子的手笔。1950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碑楼村初级小学,转赴邹平县马庄完小继续读书。深谙孝悌之道的他,在刻苦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劳动,每天的清晨和黄昏,老乡们都能看到 he 割草、放牛的身影。

1951年,郭先生只身离开家乡,前往张店市初级中学就读。在此期间,郭先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时隔三十余年,他还能清晰地列举出当



年的部分书目：“其间酷嗜小说，所读书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猎人笔记》、《烟》、《父与子》、《蒋光慈选集》、《殷夫选集》、《地下的笑声》等。”（郭在贻《自订年谱》）他在语文学学习方面的潜质被逐渐发掘出来，作文曾得到校长王玉堂先生的好评。郭在贻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时说：“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郭在贻《回顾我的读书生活》）博览群书是郭先生治学的显著特色，这一习惯大概就源于他在初中阶段所受的训练吧。尽管郭先生以训诂学名世，但终其一生都对文学作品十分钟爱。据他的弟子王云路回忆：“在郭老师去世的前四天，还让我到他家里把《普希金文集》和《唐宋名家词选》拿来读给他听。”（王云路《难以忘却的思念》）

1954年，郭在贻先生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为了给经济拮据的家庭节约开支，他提出报考学费远低于一般高中的烟台水产学校。正在浙江舟山参军的大哥得知消息后，彻夜难眠。郭连贻先生深知三弟酷爱读书，文史之学更是其志趣所在，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忍痛割爱呢？不久，郭先生收到大哥的来信，劝他改考济南市第三中学，并称自己所属的部队已经改为薪金制，能够负担得起他全部学费。这样，郭先生才放心地前往省城求学。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名为杭州大学——笔者注）中文系。值得一提的是，自郭先生阔别家乡以来，他和大哥就形成了互通书信的习惯，兄弟间的家书往还跨越三十余年，直至其病歿。《郭在贻文集》的编者们注意到，书信是郭先生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先生治学、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把所能征集到的所有先生的书信都收入了《函札存稿》，共计收录给70位友朋的248封信件”（《郭在贻文集·前言》），其中包括给大哥的家书6封。郭连贻先生在三弟去世后对所藏的家书进行了整理，装订为14册，共计679页。这批家书的数量超过了《文集》收录的郭在贻先生给朋友信件的总量，真实地记录了郭先生自“文革”后期至去世前（最后一封家书写于1988年11月1日；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的家书已在“文革”中不幸被毁——笔者注）的思想历程和生活状况。这批珍贵的史料除了有两幅作为当代尺牍书法的精品曾发表（苏晓敏《奇葩生同根，翰墨写文心》，《书法》2005年第3期）之外，绝大部分依旧珍藏在郭在贻

家乡的故居内。郭连贻先生在这座自己筹资修建的“旻庵居士故居”中接受笔者采访时,曾介绍这批家书的内容:“苦闷时多,欢快时少,几乎无一信不谈病。在贻给我的信多,我给他的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尚未发表的家书正是一部别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957年,郭在贻先生南下杭州,开始在浙江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杭州大学)深造。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参加各种运动外,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196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留校。从50年代起一直在杭州大学任教的姜亮夫先生是训诂、楚辞和敦煌学等研究领域的泰斗。是时,他已近耳顺之年,目力又每况愈下,因此向系里提出希望配备一名助手。经过在杭大优秀毕业生中的层层选拔,郭先生脱颖而出,成为姜先生的助手,被安排在杭大语言文学研究室工作。在这场角逐中,除了第一名的毕业成绩和本科阶段刻苦攻读的“盛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增加了郭先生的“胜算”,那便是高亨先生的举荐。高亨先生与姜亮夫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同学,建国后任教于山东大学。一个偶然的时机,他见到了本科在读的郭先生的读书笔记,非常欣赏这位晚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缜密思维和独到见解。当他听说姜亮夫先生征招助手时,便郑重推荐了郭先生。据郭连贻先生回忆,高先生用了“齐鲁之秀,重点培养”八个字评价郭先生。事后,姜先生曾给高先生复信。如今,这封回信便珍藏在“旻庵先生故居”里,可以作为一段学林佳话的佐证了。

从1961年到1965年,郭在贻先生在研究室内度过了四年平静的书斋生活。这段时光是他所津津乐道的,1988年,他应《文史知识》编辑部的邀请撰写《回顾我的读书生活》时,着重介绍的就是这些“夜阑人静之时,一卷在手,青灯独对,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的日子。这篇原刊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上的文章,是郭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书面形式系统地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从中,这位“齐鲁之秀”孜孜不倦的身影跃然于读者眼前:为了躲避集体宿舍的嘈杂,他借口神经衰弱,搬进了资料室里独居;以语言文字学作为读书重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先后看了三四遍,遍遍批注,层层浮签,全书“丹黄烂然”;此外,广泛涉猎文史哲以及各类书籍,以《丛书集成初编》为纲,博览前人的笔记小说;他埋首攻读,时常错过饭时,在路边买一只甜瓜



充饥后便又回到书桌前……郭先生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博学厚积,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尝中断读书,凭借自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经年累月的读书生活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这是后话。

“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2001年1月,为了纪念郭在贻先生逝世十二周年,浙江大学开始整理编辑《郭在贻文集》,由郭先生的弟子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三位先生担任主编。2002年,《文集》出版,著名训诂学家、郭先生生前好友许嘉璐先生作了长篇序言。许先生称赞郭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因为“我们的苦乐,总是与共和国的命运相伴,从50年代起,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可能是因为研究古代文献,传统优秀文化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对学问执著,对友人诚笃,对名利淡泊”(许嘉璐《序》)。郭先生的后二十年,已经不仅是“齐鲁之秀”,而是通过自己坚实的步伐,成长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文革”爆发,研究室被“砸烂”,郭先生不得不匆匆结束平静的读书生活,参加学校文艺写作班子和“大串联”,前往干校劳动。即便如此,他还是争分夺秒、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求学。1973年,他赴京修改写作班子撰写的评《红楼梦》的文章时,趁机“擅自”拜访了魏建功和游国恩两位先生,并去琉璃厂逛了一遭。1975年,在“评法批儒”运动的浪潮中,他参加了注释章太炎先生著作的工作。他把一本《章太炎著作选》寄回家乡,叮嘱大哥“窥见这位伟大学者的学问是何等的精博”(郭在贻《致郭连贻(一)》)。在那些举国浩劫的岁月里,郭先生坚守自己的学术良知,以实际行动捍卫着祖国文化的尊严。据许嘉璐先生回忆:“他常跟我说,他现在的成绩,主要是靠‘文革’十年打下的功底。那时外边大喇叭哇啦哇啦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真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文献书’。别人打派仗,他打‘冷仗’、‘硬仗’。”(许嘉璐《序》)正是在这个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郭先生的读书生活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进行专门性的研究”(郭在贻《回顾我的读书生活》)。在姜亮

夫先生的影响下,郭先生开始研究楚辞,通览了杭州大学和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所有关于楚辞的研究著作,写成了《楚辞解诂》一文,致力于解决楚辞中的诸多训诂问题。这篇文章七易其稿,是“文革”时期郭先生心血的结晶。《楚辞解诂》在《文史》1979年第6辑发表后,与郭先生的另一篇代表作《唐代白话诗释词》(刊于《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一道,为郭先生赢得了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金。

从《楚辞解诂》到《唐代白话诗释词》,郭在贻先生在训诂学的研究领域中实现了自己的新变。“文革”结束后,郭先生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拥抱“科学的春天”,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他先后整理发表了数篇“文革”期间的旧稿,除《楚辞解诂》外,主要还有《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论文和《近七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楚辞要籍述评》,以及《汉书札记》、《论衡札记》和《古代汉语词义札记》等。可以看出,郭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的研究重点是楚辞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入新时期,郭先生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考释古典文献中的“字面生僻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方俗语词。对方俗语词的研究,为郭先生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朴学界的重要地位。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郭先生继往开来,先后发表了有关论文四十余篇。郭先生对方俗语词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既汲取了前辈学者经常使用的归纳类比的训释方法,又善于把俗语词研究与文字校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二是“将俗语词的考释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追本溯源,求其会通”,“那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是他关注的重点;三是“从理论上对俗语词研究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文集·前言》)。郭先生的这些成果多为不刊之论,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1986年出版的《训诂学》中,郭先生将方俗语词的研究列为专章,这是训诂学教材编纂史上的创举,开拓了训诂学研究的新疆域。这本《训诂学》自出版后已经完成两次修订,是建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训诂学著作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郭在贻先生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题。1987年,郭先生和他的两位学生张涌泉、黄征合作,启动了“敦煌学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和《敦煌吐鲁番字典——笔者注》)的撰写工作。在《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前言》中,郭先生提



出“校勘变文必须通晓俗字”、“校勘变文必须明了方言俗语以及佛教专门术语”、“校勘原文必须谙熟当时的书写特点”和“校勘变文必须尊重原文,不可轻加改订”。这不仅是校议敦煌变文集的原则,也是郭先生一生践行的学术规范,从中不难窥见他如何“坐实”自己的座右铭“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以郭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不仅继承了乾嘉以降国学大师们的学术业绩,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了朴学精神,对于扭转学风、匡正时弊具有积极意义。

1989年1月10日,郭在贻先生病逝于杭州。此时,距离他五十岁的生日仅剩一天。许嘉璐先生在其墓志中写道:“一代俊秀,中道而殒。凶问所至,士林潸然。”(许嘉璐《郭在贻教授墓志》)此言不虚,郭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翻阅浙江省敦煌研究会编印的《郭在贻先生纪念集》便得明证。在有限的学术生涯中,郭先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以及有待于他的弟子和及门弟子们秉承的“遗志”。“在姜亮夫、蒋礼鸿两位先辈导夫先路之后,经在贻传递薪火,杭大——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敦煌学、近代俗语词和俗文字研究领域已成海内外重镇”(许嘉璐《序》)如今,“浙江敦煌学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文化现象(赵和平《试论浙江敦煌学研究的特色》),对此,郭先生功不可没。他1979年被评为讲师,198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以杭州大学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生前还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经常赴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并讲学。

郭在贻先生已经逝世二十年了,学术界并没有忘记他。在他身后,未带完的学生顺利毕业,未完成的研究项目业已结题。《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先后问世,连同他生前出版的《训诂丛稿》、《训诂学》和定稿的《敦煌变文集校议》,以及其他传世文稿,在2002年由中华书局以四卷本《郭在贻文集》的形式推出。同年,“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2004年,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生王虎完成了题为《郭在贻

治学思想与训诂成就》的学位论文,郭先生日益成为研究对象,在学术史的视野下对“郭在贻”进行考察的工作已经起步。

尽管郭先生毕生研究的是较为冷僻的学问,但他并不是一位“书呆子”,他热爱大自然,经常流连于西子湖、阮公墩和黄龙洞。他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对古典诗词也钟爱有加,他有一首《落红》诗,曰:

摇曳吟鞭下翠微,千山萧寂雨霏霏。

落红最是有情物,竟堕春衫伴我归。

“落红最是有情物”,这恰是郭在贻先生的写照。“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2010年2月22日,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林庚先生百年诞辰日。1月10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以及北大众多仰慕林先生的同学,济济一堂,共同缅怀林先生的学术与人格风范。

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教授、北大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教授、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先后致辞。袁先生用“诗人的气质,学者的襟怀”来概括林先生的一生,认为林先生总是将其诗歌创作、学术研究与其人格相统一,达到了诗歌魅力、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交融。谢冕先生指出,林先生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诗人,他不仅写诗,更把他对诗的感悟注入了生命之中,他的生命因之始终充满了诗意与诗情。先生虽然远去了,但先生留下了一个青春和创造的世界。蒋朗朗教授在致辞中说,林先生一生潜心于现代新诗的创作与古代文学的研究,他所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等观点,正体现了其作为学者兼诗人的真诚与执着,而这也恰恰是百年中文系学人们学术与做人品格的集中体现。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在外讲学,也发来贺信。

与会学者,或分别讲述求学期间所感受的先生课堂上的气韵生动与生活中的潇洒儒雅,并回忆了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或侧重分析林先生的新诗创作成就,及其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高度评价了先生在新诗写作实践和理论上所做的探索;或分别探讨了林先生在楚辞研究、唐诗研究、古代小说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等方面做出的卓越成就。葛晓音、潘建国等还就整理林先生遗稿中新发现的先生手稿、论著等作了说明。

林先生的女儿林容女士在发言中,追忆了林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同时,林容女士代表家属,将先生生前所用的讲课资料、手稿、专著、工具书等赠送给了北大中文系。(仲文)